

• 教育学研究 •

中国近代大学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养成策略^{*}

党亭军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养成重任绝非毕业论文的撰写与指导所能独自承担,而是需要一个从办学理念到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层面上的系统化培养过程。中国近代大学从研究高深学问的理念保障、学术研究氛围的营造、学术型课程的安排、学年或学期论文制度实施、课堂教学的学术性思维引导、研究型社团的学术实践、毕业论文的管理以及专门培植学术能力的研究机构设置等环节,系统性地展现了在培养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上的基本策略。

关 键 词: 学术研究能力; 本科生; 中国近代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424(2014)01-0120-05

长期以来,我们把培养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重担压在大四阶段毕业论文的撰写、指导及评价上,而对于与之配套的前提性条件的理念保障和制度设计以及实践操作平台则疏于关注。这是导致本科毕业论文“不堪重负”而险遭淘汰厄运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养成重任绝非单纯的毕业论文制度所能够独立承担,而是需要一个从办学理念到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层面上的系统化培养过程,毕业论文制度充其量不过是培养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中国近代大学在清末民初开始响应国立学术独立的呼声,一些学者不仅积极率先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还呼吁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培养问题的关注。此后,中国近代大学逐步形成从办学理念、氛围营造、课程安排、学业考核、教学改革、学术实践、毕业论文以及机构设置等环节来关注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过程。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近代大学培养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这种策略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但也存在着或多或少值得反思的弊病或教训。

一、理念保障: 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培养的逻辑基础

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清朝末年,在诞生之初鲜有大规模学术研究的实践。到了清末民初,一些学者率先自觉地担负起了学术研究的重任,而且还提出了本科生参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具体培养本

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实施建议。譬如,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准备在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提出讨论的问题之一即为“大学应如何注重学理之研求,使学生确能潜心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建议:“(1) 废讲义,一方面教员口授,学生笔述。一方面多购参考图书,由教员指定卷帙页数,令学生自阅;(2) 作报告,或报告所读书或报告特别研究之结果。”^[1]这种提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此后一些大学的管理者也纷纷强调本科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性。民国十七年,东北大学的刘副校长在秋季入学典礼上,明确指出大学生在求学时代,“不仅以读书为事,尚须有研究功夫”^[2]。

中国近代大学一些主要管理者还通过校长有奖征文的方式来引导或督促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培养问题的关注。譬如,根据民国二十四年的《光华大学半月刊》刊载“此次财部公布币制政策,关系国计民生至巨。张校长(张寿镛)为鼓励同学研究我国币制起见,特以‘汉以平準興明以濫鈔亡,试言其故,并陈币制改革后兴利除币弊方略’为题,悬赏征文。第一名奖金二十元,共奖五十名。现已收到同学之佳作极多,不日即可公布其结果云。”^[3]此次征文经过张校长亲自批阅后,在民国二十五年的《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公布了前六名的获奖名单和奖金^[4],并且又在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三日的《光华大学半月刊》全文刊载了第一名的论文,即愈振基

收稿日期: 2013-08-23

作者简介: 党亭军(1974-),男,山西芮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BAA100015)。

的《汉以平準興明以濫鈔亡試言其故并述幣制改革后兴利除币弊方略》^[5]。再如,民国十九年的《东北大学周刊》刊载了副校长奖励学生学术研究的消息,即“本校副校长刘冬轩,有鉴于学生课外著述,为研究学业之良好方法。本校自最近两年来,学生之著述,有如雨后春笋,其中自不乏名著,特为奖励学生作与起见,特向学生方面征求作品,举凡学生之课外作品及译述品,凡经出版者,均征收一份,以便择优给奖。”^[6]中国近代大学主要管理者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重视程度也就使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具有了一个逻辑上的存在基础。

二、氛围营造:创设各种学术演讲制度以培养本科生学术研究的兴趣

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言,学术兴趣培养是必备条件。中国近代大学通过创设以下各种学术演讲制度来培养本科生的学术研究兴趣。

首先是利用周会和各种重大纪念日来进行全校性的定期学术演讲活动。譬如,根据《南开大学周刊》刊载“本校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自本学期起改由十点至十点半,全体参加,前次由本校历史教授蔡文候讲‘我所希望于国民党之将来’,上次请受鲁荡平讲‘三民主义教育’,因故未到,故改黄子坚讲‘民族复兴’。”^[7]而民国时期厦门大学则把周四和各种重大纪念日作为全校性活动而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并借此进行学术演讲活动。1926年4月21日(周四),原本请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博士做学术演讲,因为马博士届时患病而改由商科主任陈荅之作关于《中国关税问题》的学术报告^[8]。此外,厦门大学就总理诞辰、总理逝世、孔子诞辰、国庆、校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国民革命军誓师等各种重大纪念日来说,都在校历中一一明确标出具体日期,并且有着先举行纪念式和学术演讲之后再放假的明确规定。

其次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学者名流举办学术演讲活动。譬如,民国三十六年,广州大学教务处定期组织学术座谈会,即“教务处为提高学生集体研究起见,特发起组织学术座谈会,定期分组举行。由各教授负责指导,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法律、教育及社会各项问题,详细办法由校务会议通过,并推曾院长如柏及胡教授金昌、英教授京等负责起草章程,日间即可公布”^[9]。再如,民国十五年三月十日下午,厦门大学请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格雷在大礼堂做关于《民主精神与体育》的临时学术研究^[10],而在次日原定安排的周四学术活动则依

旧进行,即请秉农山博士做《理想之大学》的学术报告^[11]。这种学术型研究活动的频繁举办成为大学凸显学术重要性地位的显著标志之一。

再次是校内外各种学术征文活动的举办。譬如,民国二十五年,河南大学农学会为促进本会会员研究学术兴趣起见,特别组织年度论文比赛^[12];民国三十七年,交通大学发布由运输学会举办的有奖学术征文活动消息,要求围绕“现代我国公路运输业务,试就管理之立场申述如何图谋改进而资维持论”,字数以3000至5000为限,由该会请运输界先进评阅。前3名,由该会颁发奖品,并且文章送至《现代铁路》和《交大月刊》发表,但是投稿者限于运输系同学^[13]。厦门大学为了进一步激发本科生参与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在民国十九年成立了“学业助进委员会”,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组织学生进行论文写作竞赛。具体分为中文、英文、自然科学三类论文竞赛,优胜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其各类论文负责人为中文类余骞,英文类劳伯智,自然科学类张资珙^[14]。

总之,中国近代大学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来营造一种学术研究的氛围,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发本科生的学术研究兴趣。事实上,这些措施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大学生意识到大学教育精神的实质在于学术研究,譬如,民国三十七年,董启俊在参加母校暨南大学校庆时曾坦言“大学教育,有异于中小学者,重在自由发挥,自由研究,此为大学教育之特质,亦即大学教育之精神。”^[15]

三、课程安排:基础工具性课程与学术研究性课程的有机结合

中国近代大学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还表现在具体的专业课程安排上,即在大学的前两年安排了基础工具性课程,而后两年则开始设置专业性的学术课程以及针对性的学术研究课程。譬如,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在民国二十四年度的课程设置情况为“本系自本年度一年级起,将四学年课程分为二阶段,一二年课程,致力于基本训练,俾学者于治学之方法途径及中外史实之重要关节,有明了正确之认识,健全笃实之修养,三四年级注重专门训练,学者选习各专史及专题研究,以充实其知识,培补其学力,更由教者指导,选择题目,从事于史料之搜集、排比、钩稽、史实之比较、考证、论定诸工作,以培养其研究能力。”^[16]再如,民国十九年,交通大学学生王兆富提出铁道管理学院四年级课程的性质,即“其课程性质之较其他各级略为改变,盖以上

各级专重课本之讲授,而本级课程则侧重问题之研究,专家之演讲,与夫论文之著作”^[17]。

事实上,中国近代大学专业课程的这种安排是仿效美国大学制度的产物,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之中却由于各大学课程设置与教学时数过多,教学方法上偏于讲解而忽视师生讨论以及学生自动研究的必要性,致使旨在培养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初衷大打折扣。譬如,民国二十年的《东北大学周刊》刊载了御夫的“我对于发展东北大学之意见”的文章,其中提到“减少上课时数。上课时数愈多,而自修之时间愈短。大学者,最高学府,学习专门知识者,注重研究之性质。若每人每周平均皆有30余小时之课程,除每日按时在教室听课外,自修之时间减少,终日由晨至晚,奔忙于教室之中,课外自修,仅有夜间2小时,故不欲受固定课本之束缚,而能任个性之发展,则唯有减少上课之时数,而增多自修之功夫一途耳。”^[18]民国十五年,华超在其《大学教育改革与提高问题》一文中也提到“大学教育大部分时间费于听讲,学生只知课堂上功课,与外国大学之研究所工作比,绝不相同。”鉴于此,他提出“后两年仿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对于特别有能力之学生,在后两年与于自动研究之机会,选择研究之范围,由学生提出,得全系教员之许可,凡属此自动研究之学生,不必按单位选习课程,亦不必上课,惟每学年皆有极严格之考试。”^[19]此外,中国近代的大学生也认为“因为平常功课严重,很少同学能抽空自己研究”^[20]。这是民国三十七年交通大学学生杨宝濂在回忆就读交通大学时的肺腑之言,也成为中国近代大学课程设置繁多和教师讲解时数过多从而严重制约本科生自主研究的客观史实的明证。

四、学业考核:学年或学期论文制度的实施

中国近代大学在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问题上,还积极地引进域外大学的学年或学期论文考核制度,即在学年或学期结合所学专业课程的感悟而撰写一篇学术论文,以此考查本科生在学业上的进步或存在的问题,并且这种论文可以代替学年或学期的课程考试。譬如,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唐兰执教《尚书研究》课程的学期论文题目,即在所公布的夏商文化概论、虞夏书撰述时代的推测、尚书中所见的特殊修辞法、试由尚书中考见上古史的概略、清以前学者整理尚书的成绩及今后治尚书者所应持用的方法等五个题目中任作一题,规定在六月二十日交卷,并且详细地指出了对于第一题的参考资料的意见,即“文

献上的材料,如尚书、诗、山海经、天问及上古老信录译史(此书颇杂,用之当慎)等,近世新发现的材料,为古器物及甲骨刻辞、铜器铭文等,可参考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观堂集林,地质调查所出版甘肃访古纪等及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21]。民国十四年,大夏大学因为学生参与“五卅”爱国活动而未能举行期考,所以各科教授为考查学业起见,而决定多数学科以暑期论文写作的方式来代替”^[22]。

学期或学年论文的撰写,使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具有了一种与专业课程的教学和考核有机结合的途径,也使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能够成为一种常态的管理制度,从而使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问题得到各教师的普遍关注。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胡适,他在所执教的各大学课程期间,常常公布数道题目而令学生择一进行课程论文的撰写,这种做法值得当代大学课程考试制度所借鉴。

五、教学改革:学术性思维的引导

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就在于课堂教学。中国近代大学一些先知先觉的学者开始率先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探索与改革,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对于本科生学术思维的启迪或引导。譬如,民国三十年,吴重翰在《大风》发表了自己从事大学教学的生活回忆录,其中提出“一个大学总是研究学问的场所,教学的人须有研究的精神,即使学生,也须养成有此种精神。没有此种精神,那个还配得上称做大学么?因此,授课时,我特别注重尾列参考书的事。我以为列举参考书使学生自动的去研究,比讲授书本的内容,尤为重要。”^[23]民国二十二年,交通大学学生谭猷献详细解说了四年级电机门课程《电机工程研究》的教学方法,即“教授钟兆琳先生,每周3个钟点,绩点为2。此课为学生之自由研究,由学生自行选定题目与材料,在教室当众演讲,教授不过在旁指导而已。材料可在图书馆各种工程杂志及参考书内选择,每演讲一次,颇费预备时间”^[24]。

显然,大学教学的宗旨之一即在于方法的获得。正如民国二十九年的国立中正大学的罗廷光教务长所言:提到大学求学的学业内容,即包括知识的获得、自学方法的领悟、求学工具的娴熟、欣赏的发展、健全体格的锻炼、高尚人格的陶冶,其中自学方法的领悟,大学读书可说只是得到求学的门径,知道了方法,学业方能猛进”^[25]。这种旨在促进传统意义上对于知识的记忆向方法的学习的“教”与“学”模式的

改革,在培养本科生学术思维的意识及能力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也得到学生的认同。民国三十五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邓春阳曾说“大学四年,不在于学到什么知识,而在于知道如何去学知识,即找到一把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26]事实上,从中国近代大学课堂教学的总体来说,满堂灌式的读讲义方法还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正如民国时人华超所言:“现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有了热心的眼光远大的以教育为终身职务的教员,然后总可以讨论到大学课程与教授的问题。”^[19]所以,大学课堂教学改革问题始终就是大学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教师自身的改革意识以及相应能力的问题,而大学管理者则应当围绕大学教师课堂教学的改革提供环境支持、制度保障以及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六、学术实践:学术自治组织的创办与各种刊物大学生论坛栏目的设置

为了锻炼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中国近代大学还首先积极地引导和协助学生创办了各种专业学会或研究会。譬如,根据《厦大周刊》所统计,厦门大学学生自主成立了多种学术组织,如文哲学会、社会学会、一四学会、经济学会、政治学会、史学研究会、文史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研究会、心理学会、算学学会、生物学会、法律学会等。这些学术社团还自主创办与出版会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锻炼与提升了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而且还是中国近代大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养成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27]。其次,还在一些刊物开辟大学生论坛等栏目,以推进大学生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譬如,由新中国建设学会在民国二十一年创办的《复兴月刊》,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一日的第一卷第五期起,专门开辟了大学生文坛栏目,其在本期就发表了白秀峯(河北省立水产专门学校)的《冀鲁区渔业之近况》、黄豪(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国术在中华民族复兴上的地位》、谭景雲(广州中山大学)的《日帝国主义对华领土侵略动机及最近之进展》、赵寿昌(上海东吴法科学院)翻译的《墨索里尼之政绩》、洪绍曾(上海东吴法科学院)的《一年来的英国国民政府》五篇论文^[28],为大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发表途径。

此外,一些大学校刊还往往由学生编辑与出版。譬如,民国十七年的《东北大学周刊》刊载东北大学周刊编辑部规则“主任编辑由编辑互选,编辑由各级学生选任之。各级推选编辑之名额,其分配方法:

本科每系二名,预科每科二名,师范部专科二名,附属中学二名。”^[29]而东北大学出版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在于“监督学生办理周刊编辑事宜”^[30]。这也成为本科生进行学术实践的有效途径之一。

七、毕业论文:学术能力养成的关键环节

毕业论文制度是培养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关键环节,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已经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史所印证。但是,这种制度经历了一个早期探索和逐步发展的过程,即由光绪二十九年(1904)《奏定学堂章程》的“自主论说或设计”到光绪三十二年(1907)的“毕业论文”,并且最终在民国十八年以《大学规程》的颁布为毕业论文制度正式形成的法律标志。当然,在毕业论文制度的形成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肯定和否定以及再肯定的哲学发展历程,甚至于在《大学规程》颁布之后,也有相当多的大学并没有切实地加以遵照执行。民国二十一年,李建勋曾直言不讳地说“民国十八年颁布之大学规程,虽有毕业论文之规定(第十八条),而各大学之切实奉行,盖寡。此不得不谓吾国大学教育之缺失也。师大于民国二十年添设论文研究一科,由三教授指导,每周二小时,继续一年,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教育学术之能力,并以论文之提交及良否,为毕业与否之条件,行之一年,成效颇著。”^[31]当然,也有一些大学不仅高度重视毕业论文制度的实施,而且还进行了较为大胆的创新与改革。譬如,民国二十四年,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的课程设置计划中提到“毕业论文,现本系认为绝对重要之课程。习此课者之成绩,须经本系教授会评定,断其是否及格。不及格者不得毕业。为准备此项论文起见,本系三年级学生,最好于修完三年级功课后,于该年暑假中留校开始工作。”^[32]

但无论如何,中国近代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制度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养成具有不可或缺积极作用。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在深入研究厦门大学早期毕业论文管理制度后也认为“毕业论文作为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环节,使课程学习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使毕业生得到初步的研究训练,激发、培养其学术研究兴趣与能力。”^[33]所以,针对目前存在着的对于本科毕业论文制度的一些否定或质疑的言论,我们需要的是进行理性的批驳和思考,从而在坚守本科毕业论文制度的前提下深入地探究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环境以及制度等各种问题。

八、机构设置: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培养

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仅仅仿效了

美国大学本科阶段的学制以及课程设置,而缺少了对于本科之上研究院的创设,即便有如国立北京大学等创设研究院或研究生的大学也为数不多。因此,这就对本科毕业生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科在读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效果。正如民国二十二年时任师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李建勋所言“大学毕业生尚无独立研究之能力,因为我国所办之大学完全仿造美国,前二年所授的皆为普通课程,后二年才有专门的课程,至于真正的专门研究,乃在研究院。我国大学毕业生对于学术研究上没有贡献,这便是主因之一。”^[34]鉴于此,师范大学在本年度创设了研究所。

事实上,一些大学在创设研究院或研究所之后,其目光并非仅仅关注到已经毕业和有学术研究兴趣的本科生,而同时还注意到本科高年级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民国十一年《北京大学日刊》刊载“本学门导师王静安先生,提出题目四条,招致研究员共同研究。凡本校毕业生及未毕业之高年级生,有愿从王先生研究者,均可前来报名。题目如下: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县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35]此外,一些大学还通过创设高级研究班的形式来关注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民国十九年的《南大与华侨》刊载一则消息“文理学院各系,将于最近时期,增设高级研究班。俾已毕业之男女生或高年级生之有特别成绩与兴趣者,从事高深研究,并由各该系责任担任指导云。”^[36]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大学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全方位的,即从办学理念、氛围营造、课程安排、学业考核、教学改革、学术实践、毕业论文以及机构设置等环节来全方位地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进行了关注。这种养成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策略尽管也在某些环节的具体落实或实施上存在着值得反思与改进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而言,中国近代大学对于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值得当代大学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 [1] 杂录[J]. 北京大学日刊,1918(240):2.
- [2] 李汉章.本校举行秋季开学典礼誌盛[J]. 东北大学周刊,1928(52):53-54.

- [3] 校长征文[J]. 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3):98.
- [4] 征文揭晓[J]. 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7):69.
- [5] 汉以平準興明以濫鈔亡試言其故并述币制改革后兴利除币弊方略[J]. 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10):83-95.
- [6] 副校长奖励著述[J]. 东北大学周刊,1930(102):69.
- [7] 总理纪念周[J]. 南开大学周刊,1931(104):47.
- [8] 上星期四周会纪略[J]. 厦大周刊,1926(146):4.
- [9] 提高集体研究,举办学术座谈[J]. 广州大学校刊,1947(28,29):2.
- [10] 上星期三之课外演讲[J]. 厦大周刊,1926(142):7.
- [11] 周会追志[J]. 厦大周刊,1926(142):7.
- [12] 本会一年来之工作报告[J]. 河南大学农学院院刊,1936(1):406-425.
- [13] 运输学会征文[J]. 交大周刊,1937(44):3.
- [14] 学业助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J]. 厦大周刊,1930(242):14.
- [15] 董启俊.所望于今后母校者[J]. 暨南校刊,1937(213):10.
- [16] 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M].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国立北京大学印行,1935:191-192.
- [17] 王兆富.铁道管理学院课程解剖[J]. 南针,1930(3):48-51.
- [18] 御夫.我对于发展东北大学之意见[J]. 东北大学周刊,1931(110):45.
- [19] 华超.大学教育改革与提高问题[J]. 东方杂志,1926(8):19-28.
- [20] 杨宝濂.交大生活谈[J]. 南针,1937(9):2.
- [21] 唐兰.尚书研究学期论文题[J]. 北京大学日刊,1932(2844):1.
- [22] 大夏大学开学后之进行[N]. 时事新报,1925-10-08(2).
- [23] 吴重翰.我的大学教师生活[J]. 大风,1941(83):2734-2740.
- [24] 谭颂献.电机学院三四年级课程略述[J]. 南针,1933(5):11-22.
- [25] 本校举行第八次纪念周[J]. 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0(6):8.
- [26]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M]//龙泉明,徐正榜.中华学府随笔·走进武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43.
- [27] 党亭军.民国时期厦门大学学生自治组织的特点述评[J]. 教育与考试,2013(2):65-70.
- [28] 白秀峯等五人论文[J]. 复兴月刊,1933(5):1-39.
- [29] 东北大学周刊编辑部规则[J]. 东北大学周刊,1928(50):40-41.
- [30] 东北大学出版委员会规则[J]. 东北大学周刊,1928(50):39.
- [31] 李建勋.教育学院之概况及其计划[J]. 师大月刊,1932(1):1-27.
- [32] 理学院化学系课程一览[J].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5:85.
- [33] 张亚群.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375.
- [34] 李建勋.师大研究所开学典礼讲演[J]. 师大月刊,1933(8):124-130.
- [35] 研究所国文学门通告[J]. 北京大学日刊,1922(1100):1.
- [36] 大学各院近况[J]. 南大与华侨,1930(2):5.

【责任编辑 樊继轩】